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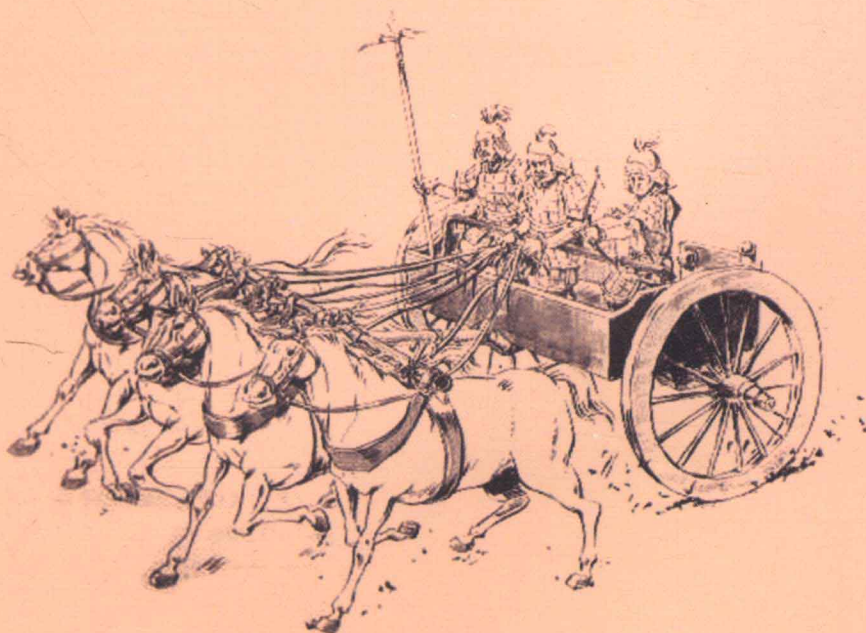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中国古代安邦治国方略

◆ 孙建民 著



白山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中国古代安邦治国方略

◆ 孙建民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安邦治国方略/孙建民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2012. 12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ISBN 978 - 7 - 5529 - 0449 - 9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政治制度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E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765 号

中国古代安邦治国方略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 - 28888689

电子信箱: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张永剑

装帧设计:王 婷

责任校对:胡顺成

印 刷: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18.75

字 数:320 千字

插 页:2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4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5529 - 0449 - 9

定 价:37.00 元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词

增强军事软实力
建设信息化军队

迟浩田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丛书

顾 问：于永波 唐天标 孙忠同 童世平 王洪尧
 郑申侠 孙思敬 赵可铭 刘亚洲 符廷贵
 杨德清 郑卫平 张志坚 杨国屏 王伟光

编委会主任：任海泉 齐三平

副 主 任：杨春长 印进宝 李继发

总 策 划：杨春长 邢志有 郭宝山 王汉水

主 编：杨春长 王汉水 刘向东

副 主 编：高润浩 郑 宁 王 平

组编 责编：张永剑

弘扬古代优秀军事文化 增强我军文化软实力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丛书序言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中央军委于2012年初，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的文件。军事科学院杨春长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经过认真学习研究，编写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丛书，并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指导，近期由白山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一个可喜研究成果，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努力发展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很有助益，值得鼓励。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许多爱国卫国报国将士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所创立和承载、体现的优秀军事传统文化精神，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爱国卫国、戍边安邦的优秀官兵。《孙子兵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上世界上也是享有盛名的兵学名著，它所阐述的治军作战的思想至今仍有学习借鉴价值。古代爱国卫国将士们忧国忘我、舍生保民的言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尉繚子·武议》）由于崇高的责任感和险恶的战场环境需要，使他们能够正视牺牲：“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论将》）“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崇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将苑·将志》）“倘图身念重，徇国心轻，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万年以下，犹令人唾骂矣。”（《草庐经略·忠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牺牲奉献成为历代优秀将士前仆后继的选择。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屡建奇功，汉武帝要给他修建府第，他却以“匈



奴未灭，无以家为”回答；东汉名将马援，以马革裹尸自誓，宣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后来他果真实现了誓言；岳飞身刺“精忠报国”四字，并用“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表达心声；文天祥“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于谦“一片丹心图报国”；戚继光“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历代民族英雄、优秀将士的这种高尚品质，不断激励、教育着后来者。有的军事典籍就号召军人，要向民族英雄学习，“奋立志气，凡于艰苦利害、死生患难，都丢在一边，务要学个相似。”（《练兵实纪·练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语）的民族精神一直在优秀军人身上实践和传承着。在几千年历史里，无数将士热爱祖国、保卫祖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的光辉言行所构建起来的古代优秀军事文化，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在建设信息化军队，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之时，学习、传承和弘扬古代优秀军事文化是很有意义的。

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我军文化软实力建设，是适应世界军事变革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新世纪以来，军事软实力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重视军事软实力是世界军事领域呈现的一个突出特点。从国家层面看，军事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的战略相关性、互动性越来越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更加依赖于包括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从军事层面看，各国军队不仅重视武器装备等硬实力的比拼，也更加看重军事理论、军心士气、军队形象等软实力的较量；从战争形态看，目前制胜理念、作战手段等正在发生嬗变，在对敌必要武力打击的同时，综合运用政治、外交、舆论、心理、法律等“软实力”，日益成为各国军队孤立、慑服、瓦解对手的重要手段。近几场局部战争充分证明，军事文化软实力不仅是综合集成军队作战各要素和影响军事硬实力发挥程度的“倍增器”，也是实施软打击的重要依靠力量。谁拥有了强大的军事文化软实力，谁就更容易在信息化战争中取得主动和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加强军事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建设和运用，是适应世界军事变革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大战略举措。

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军队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客观要求。军队和武警部队这些年来先后参加了抗雨雪冰冻灾害、藏区维稳、抗震救灾、支援奥运和搞好战备训练以及重要军事演习等重大任务，广大官兵以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觉悟，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情怀，不畏艰

险、连续奋战的战斗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展示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这是我军软实力的充分展现，也使我们对加强军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实践进一步告诉我们，军事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我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有着更为独特、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西方主要国家军队装备技术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并且这种状况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立足现有武器装备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将是长期面对的现实课题。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越需要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软实力建设，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发展，凝聚军队的“精、气、神”，形成强大的政治优势、精神优势、文化优势、机制优势，促进人与武器装备更加科学地结合，弥补在硬实力上的差距和不足，从而全面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我国古代军事文化博大精深，取其精华，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超越并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要把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础工程，积极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中汲取营养，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特别要发扬我军历史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李继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上将）

【目 录】

上篇 大气恢宏的战略思维

第一章 大处着眼，境界高远·····	002
第二章 鉴往知来，审时度势·····	013
第三章 目标宏大，器局开阔·····	024
第四章 通权达变，动态思考·····	030

中篇 体大思精的治国安边理念

第五章 国家统一：治国安边的永恒主题·····	046
第六章 长治久安：治国安边的政治目标·····	060
第七章 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治国安边方案·····	079
第八章 德化天下：治国安边的指导原则·····	097
第九章 多重命题：治国安边方略的全方位思考·····	113
第十章 “安内”与“攘外”：互补的两种治边理念·····	138
第十一章 “夷夏之辨”：治国安边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	150



下篇 智慧卓越的安邦治国战略

第十二章 追求统一：实现统一大业的基本方略·····	169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谋划国家统一的经典范例·····	184
第十四章 纲举目张：把握治国理政的枢轴·····	210
第十五章 安内怀远：治国安边的政治方略·····	245
第十六章 强边固防：治国安边的国防方略·····	263
主要参考文献·····	285
后记·····	287
未竟之“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丛书跋·····	289

上篇 大气恢宏的战略思维

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更引发人们的不尽思考。其中的奥妙曲折，中外哲人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思考并阐释下去。但回首历史，中华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许是我们必须首先予以关注的。在漫长和跌宕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无不将“治国安边”这一国家总体战略问题，作为关注的重心。而且他们在思考与探索“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时，往往能够自觉地围绕治理国家的战略性指导原则和方针、策略，通过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和战略机遇的深刻把握，规划国家的长远出路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观察、分析与解决治国安边问题的思维模式与框架，体现出大战略的大气磅礴和恢宏气度。

于是，从大战略的层面进行整体谋划就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最主要的特征。历代政治家、战略家包括兵家，普遍地从“道”（普遍真理）的高度审视历史与现实，审视人类社会的一切，从而大处着眼，以高屋建瓴、思接千古的大气磅礴，把握历史走向，预测事态发展，定位战略目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复杂关联，探求成败兴衰之理，从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提出“承敝通变”的战略对策，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重大课题。



第一章

大处着眼，境界高远

从中国文化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现象：无论哲学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在世界观、历史观、人性论方面有多大的分歧，但他们无不聚焦国家发展、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执着于追求那些隐藏在自然、社会、治乱、兴衰、得失、吉凶、祸福背后的客观规律，并且以思接千古的气魄，通过对终极规律的探讨，高屋建瓴地回应如何治国安邦这一大战略问题。

一、“求道”——中国文化对终极真理的聚焦与探求

汉语中“道”的最基本意思无疑就是“道路”。但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赫赫有名的哲学流派道家 and 宗教派别道教，道家的始祖老子又把“道”作为其哲学的最核心概念，所以人们往往把“道”与老子及道家、道教更多地联系起来。

其实，“道”的概念并不是老子及道家的专利。以“道”来指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中国所有哲学流派的共同做法。春秋以来特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要素相互激荡，产生了烛照百代的各种思想流派。虽然中国哲学派别众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坚定信念：“人伦日用有道存焉。”它们所探求的“道”，既是宇宙、社会、人生的总规律，又体现于包括从治国安边到人伦日用，乃至一石一木、一草一花的任何事物。而且，在“道”与“器”之间，中国文化更推崇和重视的还是“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哲学流派尽管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落脚点都在现实政治，即首先要“求道”——找到支配宇宙和人间社会的法则，认识和发现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然后遵循“道”行事，“求道干于事”，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实践，并在这些实践中实现

“道”的价值。于是，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会基于自己对“道”的理解和体认，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而是否求到了真正的“道”、正确的“道”，也就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主张、治国战略、政治实践乃至人生实践能否成功。

正因为以上缘由，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将优秀的战略家、政治家还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伊尹、周公型，另一类为萧（何）曹（参）型。前者是“王道”型的政治家，志在为万世开基业，追求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并因为他们“先立乎其大”，主要精力用于对自然、社会与人生之“道”的洞察和体认，所以道德、学问兼备，“万物皆备于我”，结果一旦遇到机会，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因为治平之业只不过是他们道德、学问的自然体现；后者则是“霸道”型的政治家，以具体事功为追求极限，汲汲于治国安边的具体目标，虽然他们也能在治国安边上建立一定的功业，但却因为求“道”不精、不纯，在事功上未免也留下许多遗憾，且只能成功于一时、一事。而二者之中，受推崇的则是前者。^① 这种价值判断，影响到中国历代政治家、战略家既有高远的理想，又重视治国安边政治实践中的作为。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以求“道”为理想，致力于宏观规律的探求，以探索与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为终极目标，着眼全局之成功，然后才落实于现实追求上的治平之业。

1. 老子的“自然之道”

“道”是老子所认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将“道”作为其《道德经》一书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德经》认为，“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它既是产生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它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不可言说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到充斥整个宇宙，小到存在于每一粒尘埃之中，自然界的沧海桑田嬗变，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交替，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无一不是它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自然而然，不留下任何痕迹：“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 “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衍化。

^① 贺麟：“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② 《老子·二十五章》。



老子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为其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换言之，“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同一的，人、地、天都要法“道”，既然天（即自然）之“道”是自然无为，那么人间社会的治理也应遵循和顺应这个“道”，无为而治。当然，老子说的“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而是指一切顺乎自然，而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

2. 墨家的“兼爱之道”

墨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家齐名且能够抗衡的哲学派别。墨家认为，宇宙天地间最高的法则是“义”，这个“义”，决定着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成败：“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①此所谓“万事莫贵于义”。原因在于，“义”代表了上天的意志——“天志”，这个“天志”，就像木匠手中的圆规和矩尺一样：“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②

而要按照“天志”实现“欲义恶不义”，则必须遵循“兼爱之道”：原因在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③也就是说，世界的利益已经包括了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益也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因此，全天下的人应该不分地位高低、贫富贵贱，彼此相爱，并且大家都要以大圣人夏禹为榜样，不计回报，不辞辛苦地为全天下服务，从而一起“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④在实现济世利人，为大家奉献的同时，既获得个人人格的升华（成为真正的“仁人”），又实现国家的治理与天下太平，避免因为“交相别”所导致的贫富不均、互相攻伐。

3. 儒家的“道法中庸”

儒家也把“道”作为最高的概念。儒家的经典《易经》认为，任何事物的生成、存在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道”，如可以有人生之道、君臣之道、父

① 《墨子·天志上》。

② 《墨子·天志上》。

③ 《墨子·兼爱中》。

④ 《墨子·兼爱下》。

子之道等等，而万事万物又有共同的“道”，也就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间事物的普遍性原理。

关于这个共同的“道”，《周易》曾总结道家和阴阳家的观点，将其表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对于《易经》揭示的这一“道”，冯友兰先生解释说：“世上有一物生成，必定有生成该物的物质，还有该物质生成的依据；前者可以说是一物生成的被动因素，后者可以说是一物生成的主动因素。被动因素是阴，主动因素是阳。万物生成需要阴、阳两个因素的互相作用，因此，‘一阴一阳之谓道’。”^①而且，因为阴、阳两个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而宇宙万物也处于“变易”之中，即有阳就有阴，有阴就有阳，阳可变为阴，阴可变为阳。阴阳两个方面相互联结，相互推移，相互作用，相反相成，和谐统一，这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称为“变易之道”。天地之间，凡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就是完善的、正常的。换言之，它既是自然之道，也是为君之道、为人之道，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正如《易·说卦》所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那么，如何按照“变易之道”在“变易”的世界中立身处世、应对一切事物呢？儒家的祖师孔子发明了“中庸”的概念，认为做任何事情，都要“允执其中”，不偏不倚。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儒家学说的最高命题和基本方法论，并被后世儒家视为“天下之至道”，因而也是治国安邦的最高指导原则。

所谓“中”就是不偏；所谓“庸”，就是常、普通、寻常。朱熹在解释“中庸”时就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过，也不可不及，只有既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过分，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才是“正”、“中”。这些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描绘的美人的形象：“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中’这个概念里，时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冬天穿皮大衣‘正好’，但如果在夏天，就成为可笑了。因此，儒家往往把‘时’与‘中’联系起来，如‘时中’，含义是懂得‘适当其时’，又‘恰如其分’地行事。”^②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孔子在阐释“中庸”的概念时，曾特别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①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坚守的最基本原则。儒家的经典《中庸》更对“中庸”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中庸”还是宇宙间的普遍原则，只有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把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事物和问题，不走极端，保持平衡，才能致“中和”，从而协调分歧，达成和睦、和谐一致。《左传》曾记载，昭公二十年（前522年），齐国大夫晏婴有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音希，醋）、醢（音海，肉和鱼制成的酱）、盐、梅，以烹鱼肉。”这些调料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味道，既不是醋，又不是酱的味道。“同”则如同以开水做调料，或一个乐曲，只准用一个声音，并不引进任何新的味道。“同”意味着单调一律，不容许有任何不同；“和”则意味着和谐，它承认不同，把不同联合起来而成为和谐一致。这种和谐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各种不同成分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中的作用则是达成“和”。^②

具体到治国安边的政治实践，则要按照“中庸之道”，既追求终极目标，又要有具体的现实目标；既重视长远利益，又兼顾当前利益；在治国安边手段的选择上，要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只有这样，才能使治国安边的战略与政策收放自如，进退有节，从而避免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

4. 法家的“因革之道”

在把“道”视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方面，法家与儒、道、墨并无二致，如早期法家就认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③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明确地讲：“夫道者，弘大而无形”，^④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总规律，是永恒不变的。

但这个“道”如何影响万事万物，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法家与儒、道、墨的观点截然不同。法家认为，“道”是总体、本体，但“道”并不等于万事万物，因为每一项事物都只是或多或少得到“道”的一部分，从而表现为性质不同的事物。而每项事物的性质，可称之为“理”。这个“理”就是某个事

① 《论语·雍也》。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81页。

③ 《管子·形势》。

④ 《韩非子·扬权》。

物的规律，它虽然是客观的，但相对于“道”，只是特殊规律而不是普遍规律，而且，“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事物有变化，“理”也随着变化。法家从“理”的角度对“道”的深入探讨，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对普遍规律“道”的承认和遵循，具体和实际的途径则在于研究和遵循特殊规律“理”，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善于发现和利用特殊规律“理”，才能成功，反之必然失败。尤其是，“理”随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客观性，还要求人们必须以灵活和变革的态度处理一切事物。

法家对“道”的这种哲学探讨，无疑比儒家和道家更加深刻，从而也决定了法家进化的历史观和变革的政治主张，所以法家响亮地提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法家因而嘲笑儒、墨、道的守旧思想：“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②这种“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变革观念，无疑决定了法家在制定治国安边方略时更注重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5. “求道干于事”

在从不同的角度、循着不同的思路对“道”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中国各派哲学都坚信自己的学派探求到了“道”的全部，掌握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它们在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间还为此展开激烈的争论辩驳，比如荀子批评其他各家：“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虽然荀子是站在儒家立场批评其他学派，但他却很敏锐地指出“道”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各派哲学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盲人摸象，只见到“道”的一个侧面：“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③庄子对各派哲学对于“道”的理解的批评更为精辟，《庄子·天下篇》就认为，儒家只看到“道”的枝节而不知道其根本，道家懂得“道”的根本却不知道它的枝干，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

① 《商君书·更法》。

② 《韩非子·五蠹》。

③ 《荀子·解蔽篇》。